

着力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

陈佳贵

经济形势专家谈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宏观政策取向不能改变,调控工作不能放松,调控重点更加突出。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对于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但基础还不稳固

2008年四季度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国经济已经出现由冷变暖的积极变化,形势发展比预期的要好。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企稳向上。去年四季度我国GDP同比只增长了6.8%,今年一季度又略有下降,同比只增长了6.1%;今年二季度GDP增长速度止跌回升,达到7.9%,上半年累计达到了7.1%。农业生产形势好,夏粮连续六年增产。工业扭转了增速大幅下滑势头,稳步回升。今年1—2月工业增长只有3.8%,到6月份增幅达到10.7%。消费品市场状况良好。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同比加快3.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比去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物价保持低位运行,通缩压力逐步缓解。农民工就业情况比预期的要好。春节期间返乡的农民工90%以上重新外出打工,且已基本找到工作,没有外出的农民工大都也已在本地的就业。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迹象。

应该看到,国际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还没有根本好转,我国经济回暖的基础还不稳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老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外贸出口持续下滑,外贸形势依然严峻。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1.8%,进口同比下降25.4%。

上半年贷款规模过大。2009年6月末,M2同比增长28.5%,比上年和今年一季度分别高10.6和3.0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24.8%,比上年和今年一季度分别高15.7和7.8个百分点,达到1995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M0同比增长11.5%。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4.4%,增幅比上年末高15.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新增贷款达到7.37万亿元,已远高于全年新增5万亿元的预期调控目标。

经济回暖主要依靠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民间投资还没有被带动起来。上半年,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同比增速达到41.4%,比上年同期提高22.1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只增长了34.3%,比上年同期降低了1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下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今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502亿元,同比减少2517亿元,下降22.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3%,亏损额2347亿元,同比增长14.3%。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和第二大出口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日渐增多。掌握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提高应对能力,已经成为我国能否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的关键问题。

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几乎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都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和延长了经济危机。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各国纷纷出台经济保护措施

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及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荆林波

施和刺激方案,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新动向并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2008年下半年以来,欧美频繁推出新的措施,对进口产品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实施了《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欧盟通过了《玩具安全指令提案》等。全球变暖与节能减排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借口,某些国家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二是滥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2008年下半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20起,比2008年上半年的88起高出36%。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5月,我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多达46起,涉案金额76.36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

努力提高应对能力。探索区域贸易合作新途径。认真研究国际贸易机制的新变化,在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下,探索区域贸易合作的可能性。关注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妥善处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确保国际贸易收益的稳定性。

审时度势,每案必争。充分认识国际贸易摩擦案件的连锁反应及其危害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切实做好贸易摩擦的应对工作,尽最大可能帮助企业争取好的结果。

加强沟通,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在对外方面,坚持因国而异,加强交流,探索建立双边贸易救济合作机制,妥善化解贸易摩擦;在对内方面,注重突出企业应诉主

陈佳贵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33976.14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32.05亿元,同比下降2.4%。但5月份后开始恢复增长,5、6月份分别增长4.8%和19.6%。全国财政支出28902.5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20.54亿元,增长26.3%。

当前宏观调控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方向和重点。

充分估计困难,做好中长期应对准备,在保增长中注重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决定了其调整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从国际看,各国把主要精力用于调整本国经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美国金融危机对其国内消费增长影响巨大,而其恢复有待于资产价格的稳定 and 经济增长点的形成。目前,这两方面条件的形成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美国经济的恢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从国内看,我国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改变。对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的调整以及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上升后的周期性调整,都要求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保八”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目标,也是保证就业增长的需要。在保增长、扩内需、扭下滑的同时,还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而保增长、扩内需、扭下滑,可以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提供必要的市场需求基础和物资、资金支持。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可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提升国民经济素质和国家竞争力。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出口,稳定外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要比亚洲金融危机大得多。因此,应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环境,在进出口管理、通关便利化、进出口税收、出口保险、外汇管理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出口企业的贷款,拓宽外向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同时,制定适当的财税金融政策,激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培育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高。

适当控制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长速度,优化投资结构。当前,我国的投资增速已经很高,投资规模已经很大。今年上半年,全社会投资总额达到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5.3%,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7.6%,拉动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长期保持这样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优化投资结构,绝不能为了短期刺激经济增长而又回到粗放、低效率的投资模式上;绝不能为了尽快上项目而乱投资,造成重复建设,进一步加剧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投资的超高速增长和宽松的贷款环境有直接关系。我们需要的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把“适度”具体化为数量指标,以便在实践中容易把握。否则,将来不仅会形成金融风险隐患,而且富余的资金会流入股市、楼市,过度推高资产价格,快速形成通胀压力。

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挖掘消费增长潜力。消费

体地位,发挥商会、协会的组织协调功能,提升政府部门的宏观指导能力,推动建立商务部牵头、相关部委参与的部际协调机制。

加强贸易摩擦预警,及时掌握相关动态。密切跟踪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变化,广泛搜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及早做好应对预案。及时总结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加强舆论引导,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

善于运用规则,变被动为主动。认真学习掌握国际游戏规则,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反制措施,力求把握

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主动权。同时,注意规范我国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广大企业的贸易行为,防止授人以柄。

加强能力建设,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反映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把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提到重要位置,切实加以推进。注意根据国别状况和行业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着力培养一支素质高、能力强、应变快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学者论学问

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因此,应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并把扩大消费的长期目标和短期政策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把扩大就业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积极鼓励居民创业、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尤其是鼓励发展第三产业。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机制,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强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扩大覆盖面,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镇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积极利用经济收缩期价格涨幅缩小的时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在对经济造成损害的同时,也提供了进行强制性调整的时机,是产生新机遇的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是调动资源、促进体制改革、培育新增长点,从而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重大机遇。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新技术、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和严重影响环境的企业;鼓励企业兼并,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利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改革资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金融支撑

——关于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思考

李连仲 刘新民

经过几年的努力,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当前,应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格局调整的时机,积极发展东北金融业,以金融支撑产业振兴为重点,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东北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是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推进东北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产业振兴是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阶段性成果,金融振兴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新阶段的迫切要求。产业成长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技术,二是资金。目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提升装备制造业已广泛展开。但如何将金融发展与产业成长联系起来,形成产业成长的金融支撑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东北地区以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形成了产业优势,而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的特点是企业规模大、资金和技术密集、投资回收期长,如果没有金融的有力支撑,产业就不可能形成规模,企业也难以做大做强。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适度优先发展金融,依靠金融和技术两个轮子,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

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内在需要。我国如何在新一轮国际金融竞争中把握机遇,完成从全球制造加工中心到全球现代制造业中心与现代金融服务业中心并重的战略转型;如何科学布局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网络,形成我国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腹地优势与辐射效应,无疑是事关我国综合竞争力提升和



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也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增长。那么,国际金融危机背后有着怎样的制度根源?如何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解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危机面前的鲜明差异?近日,教育部部长江学军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结合分析这些问题,阐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从金融运行和监管、美国消费模式、全球贸易结构失衡等不同角度对危机的成因和性质作了分析。但从更深层次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 的本质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刘伟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包括一些西方人士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遥远,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世界里面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对立,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广大人民公平公正地分享,导致整个社会购买力和市场需求不足,因而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地发生。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现代社会历史局限性的集中体现。这说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并不像西方学者在“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中所宣称的那般完美。与之相比,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这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但同时必须鲜明地拒绝西方所倡导的私有化。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政府对市场前所未有的干预。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有什么启示?刘伟指出,西方一直存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理性干预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二者交替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之后,严重的经济“滞胀”现象使得强调政府干预、治愈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大行其道。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经济秩序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可能导致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再次走向强调政府干预的方向。然而,

“六个为什么”系列访谈

李连仲 刘新民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大战略。从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战略任务看,面对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提高东北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必须加快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

符合区域发展的共同利益。东北地区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长期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滞后,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比较低,迫切需要通过加快金融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加快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工具;有利于通过以金融为纽带促进东北地区各省市之间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有利于在更高层面与更宽范围优化和配置资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金融资本的活力和创新力。

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有效途径

把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区域发展战略。将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并作为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应以东北亚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为总体目标,以沈阳金融体系为重要平台,逐步建立起立足沈阳、依托东北、面向全国、辐射东北亚的开放型、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体系。

进一步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强化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一是加快建设东北产权交易

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都不能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事实,证明危机的发生有着更深刻的制度根源,同时也说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西方学者提出我国改革应充分贯彻自由化原则,这不仅不符合我国实际,而且不符合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在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摇摆的事实。与之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政府与市场、整体与个体、和谐与自由、均衡与增长等方面的矛盾运动作出的崭新的、科学的处理,为把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统一起来、防止盲目竞争和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同时必须坚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银行业造成严重冲击的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却表现突出。这是为什么?刘伟说,发展经济往往把金融深化程度看作发展中国家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但现在看来,金融深化进程不能超越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制度演变的阶段,否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能带来极大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我国金融改革适应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要求,我们谨慎地推动金融深化,形成了抵御国际金融风险传递的制度屏障。但也应看到,相对于资源配置有效性需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而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存在滞后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国际化方向不应动摇,我们不能也不应放缓国际经济 的进程。这次危机表明,西方经济体制包括金融货币体系存在

深刻的内在矛盾。所以,我国经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式的“一体化”。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在扩大投资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巩固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应当怎么看?刘伟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国实施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能够很快见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大型国有企业作主导和支撑,并带动和引领中小企业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的意图可以透过微观机制很好地贯彻下去。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市场结构,为政府集中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这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所以,我们既要坚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又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六个为什么”系列访谈

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更加紧密结合,突出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特色。基于东北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的特色需求,两种资本的结合可以通过以下四种形式来实现:通过建立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促进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通过股权交叉销售,推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通过产业资本或金融资本进入对方资本中,以控股方式实现融合;以股权合作方式构建东北金融中心投资公司,整合和运营东北金融资本,促进与产业资本的融合。

以建设“国家优化金融生态综合试验区”为切入点,形成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机制。在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以金融商贸开发区为依托,以沈阳金融资源为平台,把建立“国家优化金融生态综合试验区”作为切入点,进行综合改革和创新探索,走出一条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的新路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体制动力和开放活力,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